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 赵鸣

## 毕来德与于连围绕汉学之争的述评及思考

**摘要：**瑞士汉学家毕来德与法国哲学—汉学家弗朗索瓦·于连因对汉学及中国思想的理解方法不同而起笔战，遂引发中、法学界空前激烈的讨论。中国国内对毕来德《驳于连》一书有过讨论，本文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于连的回应和法国学者的相关评论，试图对两人的学术分歧点做出更加清晰的梳理，从宏观角度对这场汉学之争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。

**关键词：**海外汉学 法国哲学 弗朗索瓦·于连 毕来德

毕来德，一位向西方人介绍庄子的瑞士汉学家，于连，一位长期研究中国的法国哲学—汉学家，因彼此对汉学及中国思想的理解方法不同而生分歧。毕来德发表抨击性的小册子《驳于连》全盘否定其作品，于连又以一本《在路上：认识中国，重振哲学》予以反击，称以毕来德为代表的反对者并没有真正读懂自己的思想，其结论仅仅出自对少数作品“盲人摸象式”的阅读。他甚至援引罗兰·巴特与索邦大学教授雷蒙·皮卡尔那场著名的论战<sup>①</sup>，试图说明对手的批判与此如出一辙。

<sup>①</sup> 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新旧两派的著名论战。1964年10月，学院派代表、拉辛研究专家雷蒙·皮卡尔（Raymond Picard，1917—1975）发表抨击性小册子《新批评还是新骗术》（*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*），将矛头对准罗兰·巴特。巴特随后通过《批评与真实》（*Critique et Vérité*）一书进行了反击：“突然有人质控这个所谓冒充的运动（即新批评），抨击它的作品（至少是部分的）为非法，惯性地憎恶及反对一切先锋派作品，认为这些著作在学识上空洞无物，在文字上故弄玄虚，在道德上危殆人心，其所以能流行，全赖趋时媚世……运用到精神、语言、艺术方面，危险这词立即表明一切落后的思想。其实这种思想时时处于恐惧中；它惧怕一切新的东西，常常贬之为‘空洞无物’（这是它通常对新事物的唯一说法）。”参见〔法〕罗兰·巴特：《神话修辞术，批评与真实》，屠友祥、温晋仪译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231—232页。

创于1897

The Commercial Press

这场笔战引起法国学界空前激烈的讨论，毕来德的书一出便备受瞩目，而包括汪德迈、利科、巴迪欧在内的多名学者也联合推出一本集子《勇于建构，支持于连》来声援于连的工作。法国学者不无戏谑地说：“昔有伏尔泰对卢梭，今有毕来德驳于连，看来巴黎和日内瓦是宿敌。”<sup>①</sup>我国学术界对毕来德《驳于连》一书有过讨论，如《中国图书评论》曾于2008年分三期辟专栏，发表《驳于连》的中文译文，并陆续刊登了国内学者的评论。然而，对当事人于连的回应和法国学者的相关评论，却始终未有引介和解读。本文的目的正是希望弥补这一欠缺，试图对两人的学术分歧点做出更加清晰的梳理，从宏观角度对这场汉学之争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。

## 一、毕来德和于连的论战

毕来德对于连的质疑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：第一，研究立足点。毕来德认为于连建立的中西比较论不过是“中国相异性”谱系的“最新变形”<sup>②</sup>，向前可以追溯到法国汉学的源头，即早期耶稣会书简中所描述的由文人官吏组成的精英中国。经过启蒙哲学派带有政治意图的渲染，以及塞加兰、葛兰言、魏礼贤、里克曼等人的描述，中国最终成为“人类经验的另一极”，一个“根本的他者”<sup>③</sup>。于连的书之所以受欢迎，不仅在于承续了这个根深蒂固的神话，更因为迎合时下趣味，用“汉学和哲学的学术新枝叶打扮了这种神话”<sup>④</sup>。对这项指责，于连完全不同意，他重申自己对中国的定位不是有待建构的“相异性”（*altérité*），而是天然形成的“外部性”（*extériorité*）。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理论来解释，如果把欧洲看作A，那么中国就是与A形成

① Frédéric Keck, “Une querelle sinologique et ses implications. À propos du *Contre François Jullien* de Jean-François Billeter”, *Esprit*, février 2009.

② [瑞士]毕来德：《驳于连》，郭宏安译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1期，第10页。

③ [瑞士]毕来德：《驳于连》，第10页。

④ [瑞士]毕来德：《驳于连》，第11页。

矛盾关系的非 A，而非相异性所代表的与 A 形成对立的反 A。中国是没有被纳入西方语言 - 概念景观范围内的文化，至于它是不是那个柏拉图定义下的“他者”<sup>①</sup>，则需要“上路”一点点地去发现。这种映照法不止限于两种文化之间，也可能发生在欧洲文化的内部，比如“恶 - 否定性”、“神话 - 逻各斯”、“摩尼教 - 斯多葛派”、“叙述 - 描写”等等。自己对东方思维的体悟和总结，绝非闭门造车式的主观想象，而是受启于上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留学的真实经历。

第二，研究方法。毕来德认为，于连的预设框架就是构建中西两种思维模式的对立，通过一种模式凸显出另一模式的特性，因而他在文本的选择和阐释上，仅取用那些有利于支撑自己论点的成分。以《过程与创造》为例，于连对王夫之思想的分析脱离了整个时代背景，“把王夫之这个卓越的人物收进了一幅暗淡无色的壁画中”<sup>②</sup>。其结果就是延续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无知和不解，加剧双方的封闭。于连称毕来德正是承袭了欧洲汉学一手建立的“东方主义传统”，重视文献考据和文本注解，以“生平 - 作品”为标准范式，却拒绝理论，从不提出问题，构建思想。汉学不应再做少数专家收藏把玩，偶尔向大众展示博闻强记的“异国珍奇”，而需要接受哲学方法论的改造，走向“实用化”。这个实用性，体现在它可以实现思想的迁移，检视欧洲所谓的“普世概念”，开创新的可思局。毕来德认为哲学不论在何处都是“对个人伦理和智力的探索”<sup>③</sup>，于连立刻反驳说哲学是欧洲的特产，以“提出问题”和“创造概念”<sup>④</sup>为天职。它在自我铺陈的过程中将二元对立确定为认知世界的基本模式，整个西方文化也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两极间摆动。现在于连提出的问题就是：如何在这些固定下来的对立之间找

① 从柏拉图的《智者篇》开始，“他者”（l'Autre）成为一切辩证法展开的必要工具，即要证明某个观点，必须人为制造出一个反面与其对辩。

② [瑞士]毕来德：《驳于连》，第 15 页。

③ Jean-François Billeter, *Contre François Jullien* (Paris: Allia, 2007), p.42.

④ François Jullien, *Chemin faisant, connaître la Chine, relancer la philosophie* (Paris: Seuil, 2007), p.58.

到新的方向？从这个母题出发，在希腊和中国之间一点点建立起概念的网络。针对文本选择上的断章取义，于连举了好几例来反驳，如他的《内在之象》、《道德奠基》分别以整部《易经》、《孟子》为研究对象，还有一些作品，其内容决定了文本选择必须多样，如涉及美学史的《大象无形》，《势：中国的效力观》则关系战略、政治、文学等多个领域。

第三，立场选择。这当中不仅牵涉于连以双重身份横跨哲学、汉学的合法性，也包括他在价值判断上采取了回避态度，不谈自己是中西碰撞过程中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，也不谈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思想形成的重大影响。于连的回答是，哲学、汉学两手抓未尝不可，自己是既做汉学的文献工作，走入一段文本、一种语言的特殊性当中，“近读中国”；又做哲学的理论工作，将这种特殊性上升为更具意义的普遍性，“远读中国”<sup>①</sup>。至于他对中国思想不做过多政治解读的原因：首先，他的确在进行一项康德式的批判工作，只是这种“批判”，不是一上来就摆明立场选边站，而重在拷问：中西文化偶然的“交叉”和关键的“分叉”，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于连在与中国学者杜小真对谈时说，哲学传统内部保留着未被提问的基础，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基础上提出，“而对这个基础我们却不能提出问题”<sup>②</sup>。类似“进程思维在中国阻碍了人的解放”这样的价值判断，只能是理论澄清后第二步要做的，通常出现在自己作品的末尾章节。他描述中国的主要目的，是想提醒西方人，最难的是拔除自恋，懂得在思想中退后反省。其次，文化不是铁桶一块，而是复杂的多面体，毕来德将中国思想的一切成因都归结为政治操作，而不考虑经济、社会、生产方式、阶级关系等维度，是不是也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呢？

第四，翻译策略。汉学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古文的翻译，毕来德认

<sup>①</sup> François Jullien, *Chemin faisant, connaître la Chine, relancer la philosophie*, pp.50—51.

<sup>②</sup> 杜小真：《远去与归来，希腊与中国的对话：关于法国哲学家于连的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57页。

为，于连夸大了翻译的困难，它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得到解决。法语和中文都有一词多义现象，然而单词一旦放在句子当中便有了特定的所指，具体的语境缩小了它的含义范围，使其他解释成为不可能。因此，通过上下文理解、翻译句意比辨析单个的词义来得重要。于连回应说自己与毕来德代表了两种翻译取向。毕来德在做归化式的翻译，通过西语为中文“祛魅”。例如“夫道不欲杂”一句，毕来德译为“*Le Taodoitavoir un but précis*”（直译：“道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”），完全忽略了 *but*（目标、目的）是构成西方哲学基底的一个关键词，对应“目的论”、“意义论”，是理式向外投射型思维才会使用的字眼，不可能出现在过程型思维的汉语文化中。“道”是“通达”、“循环”，没有目的。于连自己的翻译则倾向于“异化”，尽量忠实于原文，有时甚至走向极端，字字直译，如诗句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（*hommes reposant- (des) canneliers (les) fleurs tombant, nuitcalme-printempsmontagne vide*）。他希望将中西语言的差异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西方读者，因为差异最能给人以启示。可以说，翻译既是汉学家于连的工作内容，又是哲学家于连的思考工具。*nature*（自然）、*existence*（存在）、*vie*（生命）、*espace*（空间）、*temps*（时间）等等这些今天看来如此稀松平常的惯用词，其实都是欧洲思想的特产，并不必然地存在于其他的语言和文化中。于连认为，逐一考察分析这些关键词的普世性，消解文化沙文主义，才是汉学真正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。

## 二、学界争鸣

毕来德和于连这场针锋相对的论战迅速引起了中法学界的激烈讨论。对于谁是谁非的界定，学者与学者间，包括中国学者内部，说法不一，结论随着所处视角的变化和解读方式的差异而呈现多元性。赞同毕来德的一方认为于连最为人诟病之处，正在于他对中国文化只唱赞歌不

提忧患。例如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冬君，作为“刘泽华学派”<sup>①</sup>的一员，她坚持“用王权主义解读中国”的做法，像于连那样陶醉在对中国文化“内在性”的赞美中，“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，更解决不了王权主义下的基本人权问题，只能为王权的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提供依据”<sup>②</sup>。在《争夺孔子》一文中，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毅衡一针见血指出了两位汉学家的分歧：“于连把中国哲学非政治化，毕来德把中国哲学政治化。”<sup>③</sup>将“他者性”推向极端的做法也许对伏尔泰和于连的欧洲有用，可以成为治疗西方理论顽疾的灵丹妙药，但对中国人来说不但没用，甚至有害。国内新庄学宗师张远山认为于连与大多数中外学者一样，属于对史料不加辨析径直引用的“轻信者”<sup>④</sup>，只看见儒家代表的庙堂中国，不见道家代表的江湖中国，专制庙堂恰恰掩盖了中华帝国的历史真相。

相反，也有学者站在于连一方。如李春青教授称于连和毕来德所做的根本是两码事，他专门举了一个长城的例子来说明问题：于连是在赞美长城本身的雄伟壮美和建造工艺，毕来德却批评他忘记了秦始皇的残暴。毕来德“追问真相”，试图揭示文本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和意识形态；于连却在“建构意义”，仅仅关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本身的特点，“他所操练的本来就不是政治一意识形态批评方法”<sup>⑤</sup>。法国学者谢弗认为，批评于连不顾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历史演进，实际是混淆了两个东西：历史的长时段和对历史性的否定。作为汉学母学科之一的历史，其研究必然需要建构时间框架，围绕时间段来进行，而分析模型的建立只能以长时段为基础。生物学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

① 刘泽华(1935—)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，尤其是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。代表作有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、《中国的王权主义》、《王权思想论》、《先秦士人与中国社会》、《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》(合著)等。“刘泽华学派”则是毕来德个人给出的一个说法。

② 李冬君：《真理之辨——读毕来德〈驳于连〉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5期，第44—45页。

③ 赵毅衡：《争夺孔子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1期，第31页。

④ 与此对立的另一种路向是以“古史辨”专家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者。

⑤ 李春青：《为于连一辩——兼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立场与方法问题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6期，第44页。

可以反驳对于连的误解：长时段与事件的关系，恰如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的关系，个体发生学不会质疑种系发生学的合法性，因为元素间的作用效果唯有通过极为漫长的时间方能显现。种系发生学的认识来自个体发生学的总和，而长时段下的宏观立论不等于否定了当中个体的复杂性。<sup>①</sup>

那么于连的研究为什么会饱受争议？在法国同行的眼中，这场笔战背后牵涉的不仅是学科之争，还有学派之争、意识形态之争。学派之争，从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评论中可见一斑，他曾向另一位汉学家，也是德国波鸿学派的奠基人之一——罗哲海问起对于连的看法，后者回答他拒绝阅读于连的所有作品，因为他将中国描述为“他者”。众所周知，罗哲海是波恩学派的敌人，而顾彬所在的波恩学派则是于连公开的朋友。于连的遇冷，说到底因为一个词，这个词也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：*déranger*（法语词，表示“打乱、打扰、妨碍”）。这就是说，他把学术界原本平静的一汪池水给搅乱了，给大家惹了麻烦，让人不爽。这个“不爽”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动摇了学术正统性，不但揭了哲学的“老底儿”，也让汉学由来已久的弊病暴露无遗。皮埃尔·夏蒂埃在《勇于建构，支持于连》一书“告读者”中说，自二十世纪60—80年代“法国理论”引起轰动走向全球后，哲学界便日渐式微，再也无法发动新的思考，对于连的口诛笔伐恰恰反映出回避思考的困境。反观汉学，顾彬和巴迪欧不约而同地认为，它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小圈子，汉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“猎人”和“收藏家”<sup>②</sup>，不断地搜集数据、堆砌事实来建立对中国的认知，却以“缺乏科学性”为拒绝对事实作出解释，在观点间建立联系。然而构建思想的能力，正是来自后者。另一个原因是于连犯了“政治不正确”的忌讳。所谓“政

<sup>①</sup> Cf. Jean-Marie Schaeffer, “François Jullien”, in *Oser construire, pour François Jullien* (Paris :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, 2007), pp.74-76.

<sup>②</sup> Wolfgang Kubin, “Contre les néo-figuristes. Pourquoi la Chine est importante, mais la sinologie insignifiante”, in *Oser construire, pour François Jullien*, op.cit., p.103.

治正确”，即是将中西关系固化为以下两种模式：一是主动犯罪者（欧洲）和被动受害者（中国）；二是民主（欧洲）和专制（中国）。正如布鲁诺·拉图尔所言，这场论战反映的实质依然是“普世”的问题。

面对眼前这个需要了解的客体（中国），已经预备有一整套术语来定义什么是“帝国”、“权力”、“统治”等等，而这个标准的丈量权在西方。曾几何时，欧洲人尝试以基督教中的“上帝”征服世界，时至今日，这个“上帝”已经被偷换成了“人权”。巴黎七大教授弗朗索瓦兹·加亚尔在《思考的危险》一文中说：“于连是危险的，因为他笔下的中国，对超验性思维而言是陌生的，也对目的问题毫不关心。从哲学角度来看，它与民主根本不能兼容，因为后者的根基在于权利的超验性和对共同目标的追求。换句话讲，在人权这门宗教的传播上，于连无疑是个糟糕的传教士。”<sup>①</sup>汉学界的主流是跟随“后殖民主义”意识形态，“自觉引用那些多少带有左派倾向的非汉学家的观点”<sup>②</sup>，现在于连却跳出来告诉大家，东西方完全是平等的，东方人的思维一点不比西方人差，不仅可以达到和西方哲学一样的高度，甚至在很多方面更胜一筹，这就踩过了线。

### 三、总体思考

基于以上对毕来德、于连之争以及国内外相关评论的梳理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他们一位是秉承了欧洲传统的资深汉学家，另一位是哲思独运、高屋建瓴的天才哲学家，一个在做具体的实证，一个在做抽象的建构，两项工作都有意义，都很必要。毕来德的问题——其实也是汉学的问题，在于重实证轻理论，无法找到方法论工具，建立理论模型。但同时他也有贡献：例如在《驳于连》一书中，这位瑞士汉学家专门介绍了中国国内“反思派”历史学家李冬君的代表作《孔子

<sup>①</sup> Françoise Gaillard, “Du danger de penser”, in *Oser construire, pour François Jullien*, p.12.

<sup>②</sup> Wolfgang Kubin, op.cit., p.104.

圣化与儒者革命》，作为一个欧洲人，他的感受是直到今天，“多数西方读者（包括学者）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模糊的”<sup>①</sup>，欧洲人看中国和中国人看自己，出发点和关注点一定有所区别，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述说，“往往是欧洲人不太关心的或者根本接触不到的”<sup>②</sup>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毕来德可谓用心良苦，他不但是庄子在欧洲的“代言人”，也希望尽可能地将中国本土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介绍到海外，使西方人对中国思想有更加全面的了解。相较之下，于连的特点——也是哲学的特点，在于敏锐的洞察力和为思考建模的能力。他将中国人自己不甚留意的那些边缘术语：“势”、“效力”、“平淡”、“潜移默化”等从各家文本中抽取出来，集结成表达共通之处的意义网来解释中国思想的整体特征。但问题是，理论模型的建立必然伴随有公式化和主观化的缺陷，于连自己也说，中国思想充满了不可定位、“不可归于范畴”的东西，而他作为哲学家的目标却是“制造框架”，这就注定了他的思想轨迹一定是“先定向的，先成形的”<sup>③</sup>。

同一棵古松，看在木商、植物学家、画家的眼中便有了三种变形。同一个文人，汉学家毕来德看到的是现实——吃皇粮的朝廷官员；哲学家于连看到的是传统——“其言曲而中”的文人思想。用《中国图书评论》2008年第5期主持人程巍的话来说，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阐释“中国”，而“每一种阐释的背后都晃动着阐释者自己的身影”<sup>④</sup>。既然这场争论围绕于连展开，作为结语，我们要说没有哪种观点或方法是无懈可击的，但不能因此否定了他的学术贡献：对法国人而言，于连理论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即便在前辈学人中也很难见到，他对古代文本的全新解读真正激发了一批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兴趣，《论语》再也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“枯燥乏味”的道德规训，而处处透露出东

① [瑞士]毕来德：《对李春青教授文章的回应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6期，第45页。

② [瑞士]毕来德：《对李冬君、张远山、刘军平三篇文章的回应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5期，第62页。

③ 杜小真：《远去与归来，希腊与中国的对话：关于法国哲学家于连的研究》，第32—33页。

④ 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2008年第5期“主持人语”，第38页。

方智慧的光芒；对中国人而言，于连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积极宣讲人，他的治学方法和思考问题的“外部”视角更能给我们以启发，丰富对自身的认识，甚至开发出反向操作的可能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1.〔瑞士〕毕来德：《驳于连》，郭宏安译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1期。
- 2.〔瑞士〕毕来德：《对李冬君、张远山、刘军平三篇文章的回应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5期。
- 3.〔瑞士〕毕来德：《对李春青教授文章的回应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6期。
- 4.杜小真：《远去与归来，希腊与中国的对话：关于法国哲学家于连的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5.李春青：《为于连一辩——兼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立场与方法问题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6期。
- 6.李冬君：《真理之辨——读毕来德〈驳于连〉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5期。
- 7.王论跃：《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》，《湖南大学学报》，2008年第4期。
- 8.张远山：《为毕来德中国观作证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5期。
- 9.赵毅衡：《争夺孔子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，2008年第1期。
10. François JULLIEN, *Chemin faisant, connaître la Chine, relancer la philosophie* (Paris: Seuil, 2007) .
11. Jean-François BILLETER, *Contre François Jullien* (Paris: Allia, 2007) .
12. *Oser construire, pour François Jullien* (Paris: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, 2007) .

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